

觀其會通

呂思勉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紀念文集

華東師範大學呂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呂思勉研究中心 編



觀其會通

吕思勉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纪念文集



华东师范大学吕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吕思勉研究中心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观其会通: 吕思勉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纪念文集 /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吕思勉研究中心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325-8611-0

I. ①观… II. ①华… III. ①吕思勉(1884-1957) — 纪念文集 IV. ①K825.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28359 号

观其会通

——吕思勉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纪念文集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吕思勉研究中心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6.25 插页 2 字数 378,000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8611-0

K·2380 定价: 9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目 录

吕思勉与“新史学” 王家范 / 1

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

——吕思勉与新史学 虞云国 / 36

宗族与宗法的历史特征

——读吕思勉《中国制度史》第八章《宗族》 钱 杭 / 59

吕思勉和吕著《秦汉史》 王子今 / 71

吕思勉《三国史话》的意义 章义和 / 82

吕思勉与隋唐史研究 施淳益 / 91

论吕思勉的宋史观 虞云国 / 112

吕思勉的中国近代史书写 赵庆云 / 127

吕思勉的社会史研究 黄 伟 / 135

吕思勉与唯物史观 张耕华 / 148

吕思勉的历史编撰学

——以《秦汉史》为线索 张耕华 / 159

时势与理路：“整理国故”运动与吕思勉的史学道路 王 刚 / 181

吕思勉与《古史辨》 李 波 / 202

吕思勉和杨宽的师生交谊与学术认同 贾鹏涛 / 217

吕思勉小说理论探微 李磊明 / 233

吕思勉《小说丛话》对太田善男《文学概论》的吸入

——兼论西方小说艺术论在晚清的移植 关诗珮 / 241

青年吕思勉与《中国女侦探》的创作 邬国义 / 267

民初小说理论：管达如《说小说》与吕思勉《小说丛话》

新探 邬国义 / 285

晚清民初“小说界革命”与吕思勉文学活动考论 王 刚 / 316

《高等小学新修身教授书》导读 陈卫平 / 338

《新式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导读 程 怡 / 348

《新式高等小学历史教授书》导读 程念祺 / 356

吕思勉与《白话本国史》 李 波 / 363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查禁风波探析 王 萌 / 381

百余年来吕思勉著述的出版、整理重印情况的综述

——写于《吕思勉全集》出版之际 张耕华 / 395

后记 / 415

吕思勉与“新史学”

王家范*

从“新史学”之名由梁启超于 1902 年正式揭出算起,至今已有 105 年。吕思勉自述 6 岁至 8 岁即和史学发生关系,13 岁起读梁先生的文章,治学的道路实受康、梁的影响,虽父师不逮。16 岁起读“正史”,至 23 岁已将正续《通鉴》、“二十四史”与“三通”^①读过一遍,从此专意治史。在往后 50 年的生命历程里,吕先生笔耕不辍,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新史学”事业,给我们留下 1000 余万字的遗著、遗文。笔者不揣浅陋,兹就吕先生的学术创造与“新史学”的关系,以及“思勉人文学术”的特点,略抒己见,以纪念先生逝世 50 周年。

引子:“燕石”之为宝在识与不识

吕思勉先生在世时,不喜张扬,远离名利之场,但其孜孜以求的业绩早为学界通人看重。1945 年,顾颉刚盘点已编著出版的新式通史,不下四五十部,看得上眼的有七部,吕先生一人占据两席。这就是 1923 年出版的中国第一部《白话本国史》,以及 1940 年、1944 年先后出版的《中国通史》上、下册(今命名为《吕著中国通史》)。顾先生对前者已赞扬其为通史写作的“新纪元”,而对后一部再加 71 字点评,可见欣

* 作者简介:王家范,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员。

① 吕生平纪事请详参李永圻《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书店,1992 年。“三通”之中,吕先生最推崇马端临 348 卷《文献通考》。中国通史合“理乱兴亡”(政治史)与“典章经制”(文化史)两大板块的想法,就是受马氏的启发。

赏备至。^① 追溯至4年前,吕先生把全部“二十四史”从头至尾至少阅读过两遍以上,系统读完正续《通鉴》、“三通”的时间要更早些,从而而被前辈誉为史界传奇。^②

吕先生离世50年后,超过1000万字的遗著、遗文大部分都获得了重印出版,另有一些未刊的文字亦在整理之中。其中除大家熟悉的两部通史、四部断代史、一部近代史外,两套完整的初高中教材在长期隐没后,也将陆续重新面世。^③ 正值新时期中学历史课程改革颇多争议之际,建议教学界给予应有的关注,相信细读之下必会产生不少启发。^④

先生从六岁起就开始读经史古籍,每读不仅句读批点始末,且认真写作札记,68年风雨不辍,积篋累筐。^⑤ 1937年3月,先生把从少年起就开始写作的读史札记汇编成《燕石札记》,第一次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上年10月,先生写成《自序》,称这些札记为“半生精力所在,不忍弃掷”,自谦地说:“千虑一得,冀或为并世学人效土壤细流之助而已。僥

①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下编第二节。对《吕著中国通史》的评点如下:“其体裁很是别致,上册分类专述文化现象,下册则按时代略述政治大事;叙述中兼有议论,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上海世纪集团“世纪文库”本,2006年,第85页。

② 先生自谓通读《史记》、《汉书》、《三国志》四遍,《后汉书》、《新唐书》、《辽史》、《金史》、《元史》三遍,其余都只是两遍而已。但这是1941年时说的话。见《吕思勉遗文集》第33页,《我学习历史的经过》。黄永年教授的回忆:“吕先生究竟对《二十四史》通读过几遍,有人说三遍,我又听人说是七遍,当年不便当面问吕先生,不知翼仁同志是否清楚。但我曾试算过一笔账:写断代史时看一遍,之前朱笔校读算一遍,而能如此作校读,事先只看一遍恐怕还不可能,则至少应有四遍或四遍以上。这种硬功夫即使半生致力读古籍的乾嘉学者中恐怕也是少见的。”回忆录收入《学林漫录》第4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69—70页。

③ 据目前不完全统计,吕先生编著的大学与中小学中国通史教材,按时间顺序先后有:《新式高等小学历史教授书》(6册,与庄启传合著,1916—1917年中华书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中国历史讲义》(1920年,未刊)、《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更新初本国史》(4册,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新学制高中教科书本国史》(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2册,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高中复习丛书本国史》(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初中标准教本国史》(4册,1935年上海中学生书店)、《吕著中国通史(上册)》(1940年上海开明书店)、《吕著中国通史(下册)》(1944年上海开明书店)、《初本国史补充读本》(1946年上海中学生书店)等,另有许多提纲、教学参考与演讲、问答等通史教学样式。4部断代史实是先生另创的“史钞”样式大通史的一大半。此处6部计其代表作。

④ 对吕先生在中学历史教材方面的成就,笔者另有《吕著中国历史教材研究议》,刊于《历史教学问题》2008年第1期。

⑤ 钱穆先生回忆:“(1945年后)诚之师案上空无一物,四壁亦不见书本,书本尽藏于其室内上层四周所架之长板上,因室小无可容也。及师偶翻书桌之抽屉,乃知一书桌两边八个抽屉尽藏卡片。遇师动笔,其材料皆取之卡片,其精勤如此。”《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第292页。

蒙进而教之，俾愚夫不至终宝其燕石，则所深幸也。”^①

这里说的“愚夫宝其燕石”，先生在后来的著述和演讲中多次使用，源自《后汉书·应劭传》。《太平御览》把这则故事演绎得更细一些。说是宋国有一个“愚夫”，从齐国宫室“梧台”以东觅得一块燕石，以为是无价珍宝，西归收藏于室，迺遐闻名。有一位周人慕名前去观宝，主人郑重其事，“端冕玄服”接待客人，打开里三层外三层的丝绸包裹，宝藏终于露画。不想这位客人见后，掩口卢胡而笑曰：“此燕石也，与瓦甓不异。”主人大怒，自此藏之愈固。^②用“燕石”典故或可视为一般的自谦，若联系先生学术的百年遭际，则觉得内中大有意思。

先生不喜走访知名人士，自述见名人辄自远，不涉无谓的社会交际。没有学历学位，无党无派，遵从父训，一生唯好教书授业，小学、中学、大专、大学都教过。1926年进入光华大学，不久即受聘为新办的史学系系主任，遂自托为终身归宿，重要的学术创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前后凡30余年。他多次提到，与康、梁、章、严、蔡这几位当世名人皆不曾谋面，虽无雅故，但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尤其是康、梁，治学宗旨和路径受他们的影响，远远超过亲炙的父亲和老师。^③先生读了不少国外社会科学的书，多靠“和文汉读”，以及当时为数不多的中译本。日看报章杂志，自少年时就养成习惯，时事动态了然于胸。可以说，先生的拜师问道是不论古今、不拘门户，众采博取的，但也绝不依傍借重，随风披靡，始终一依自己的秉性，治学讲求沉稳平实。惟其沉稳内敛，不好张扬，议论的深刻往往也只有在反复品味后，读者才会突然其来获得顿悟，眼前为之一亮。

仅举非史学、实史学一例，以为“引子”。1952年，先生写有一篇《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遗文集》收录这篇未刊手稿时改题为《自述》，全文约12000字。先生殚心积虑，精细写作，把一生治学观世的经

① 现由华东师大出版社汇编前后两辑总成《吕思勉读史札记》，恢复了过去许多删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② 见于《后汉书·应劭传》，又载于《太平御览》卷五一引《阙子》。

③ 先生自谓：“予年十三，始读梁先生所编之《时务报》（创刊于1896年——笔者按）。嗣后除《清议报》以当时禁递甚严，未得全读外，梁先生之著述殆无不寓目者。粗知问学，实由梁先生牖之，虽亲炙之师友不逮也。”《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第10页。对康、梁、严、章、蔡，先生均撰有纪念文章，参《吕思勉遗文集》（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85—406页。

历,以及学术事业、个人思想方面的变迁过程,作了要言不烦的综述,没有一句空话假话,却不少委婉曲折的笔法。对研究晚清民国以来知识阶层的复杂心态,这是一份难得的“原生态史料”^①。

此文内容涉及太广,这里不可能作专门的讨论。有一情节,颇见先生历史通论的特色。当1952年高校“思想改造”之时,每个教授都必须检讨自己是属于哪个阶级的。先生的检讨,说自己的思想来源“属于资产阶级”,不同意一些人把他定性为“有封建时代余习”。理由申述,着实叫人惊叹,由近及远,由此及彼,恣肆发挥开去,简直成了一篇有关“时代与个人”主题的史学宏论。

先生说:因为我的立身行事常常以古贤士大夫为楷模,喜好引用他们的话,所以往往把我看作有封建时代余习的人。这样的看人,这样的人物鉴识,太粗糙,太浅了。因为人的性质,在深处自有其根底。所处的环境与这种根底没有伤害的时候,可以接受环境的熏染。到了两不相容的时候,这种德性的根底就可以把过去的习性弃如敝屣。

接下来一段时代总括,就显示出先生历史通贯的水平。他说:人类的德性,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封建主义时代曰勇,资本主义时代曰智,社会主义时代曰仁。”这不能不使我联想到司马迁论三代风气周转如环的那段著名史评,那种史学名家独有的大气。^②

先生兹后的解释,列举了好些古代人物的典型习性,用以论证封建时代之德性为“勇”,亦即是“忠”。又回到了正题,反问:后世还有这样的人物吗?难道就不再有像他们那样看重志节、视死如归的人了吗?不是。只是因为社会的变化,他们的心理安顿也发生了变化,知道不应该再是效忠于一个人。资本主义兴起,人日益向“智”的方向发展,知道个人是不足为之效忠的。因此也可以说,封建主义久绝于中国,死灰是不可复燃的。“在今天,有进于社会主义而涤除其资产阶级之积习者,守封建主义之余习而未达资产阶级之思想者,则无有也。”

最后一句话,是夫子自道,但意义不止于此。发挥开来,是说知识

① 《吕思勉遗文集》(上),第434—452页。

②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弊,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小人以僇,故救僇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

阶层随时代行进,思想层层相因,相叠相变,十分复杂,内含有关于人类之德性乃至社会的变迁均连续累进而非绝对断层决裂的历史睿智。一个人的思想,特别是处在社会动荡转折时期,哪有像划阶级成分这么地铁定单一?其实,社会的变迁也何尝不是如此?新旧并陈,因缘交叠,抽刀断水水自流。这一意思乃是先生毕生史学通贯功力的透出,决非信手写来。

读这篇《自述》也有许多难点。例如前头曾交代过自己的思想有过三期变迁,大意是第一期信康梁之说,笃信大同之境及张三世之说;第二期,信仰开明专制主义之说,但以改善政治为大同之第一步,认为法家督责之术可以治政治上的弊病;第三期,深为服膺社会主义,认为这是大同之境的可致之道,人类之行动可致转变一新方向。^①到思想改造交代个人阶级属性时,可以理解当时不便以“社会主义思想”自居,然而却给自己套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初读莫名所以,殊不可解。

再读下面一段话,就觉得先生竟有几分难得的幽默,幽默中不乏犀利。先生紧接转向又一话题,但在当时也是人人必须交代过关的一个问题。先生说:现在有人认为亲美、崇美、恐美,大学教授比比然如此,这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那么你有没有?没有(大概当时认为先生乃属于旧式民族主义者,故并不怀疑他会亲美——笔者按),怎么说你也属于资产阶级思想呢?先生回答说,亲美、崇美、恐美,不能说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无亲,惟利是图。资产阶级,特色在智。智则知人之所至,我亦能之,何足崇焉?惟利是图,知己知彼,力足敌之,则抗之矣,又何恐焉?故真资产阶级,当赞成抗美。其不然者,其利依附美帝,所谓买办阶级也,直奴才耳。^②

上述那种设问与论证,层层剥笋,环环力逼,很像孟夫子的善辩文风。先生虽然套了当时习用的“封建”和“资产阶级”等词,但显然是在“现代性”胜过“封建性”的意义上使用的,是在讨论“数千年未遇”的社会变迁,以及时代精神的演进。先生用这一方法为“资产阶级”说话,在那时真是足够大胆,不知道挨批了没有?而在今日,较有些谈论“现代

① 《吕思勉遗文集》(上),第439—440页。

② 《吕思勉遗文集》(上),第448—449页。上述原文,有些地方因多带文言语气,笔者不揣陋拙,试译作语体文,但关键处,不敢径改。

性”的，特别像回答“全球化”与本土意识这类两难诘问上，还是棋高一着，说得深透。“资本主义精神”帮助人类发现了自我，这种“智”的精神，即民智的开发，传播到哪里，自我中心的意识便高涨到哪里。由此，我们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便看得更清楚了，“全球化”的风潮刮得越厉害，个人主义、民族主义也随之喧嚣奔腾。看似矛盾冲突，实为世界变迁的一体两面，不能舍割。什么叫做识大而会通？这就是。

这虽然是比较特殊的一例，但像这样有深意的历史通识或时事见解，先生在学术论著中随处可见。除初高中本国史教材和一些演讲稿比较好读外，四部断代史、一部《中国制度史》，包括最负盛名的《吕著中国通史》，不说大学生，就像我这样教了多年的通史，也是慢慢细读，读了好几遍，才逐渐品出一点醇香来。

历史待我们总究还是宽厚的。先生的学术成就终于得到了如实的肯定，值得欣慰。经得起时间考验而传世的，一定有长久的价值在。如何准确估计和透彻认识“思勉人文学术”的独特价值，真正把先生毕生凝聚的学术精神和治学路径学到手，正是作为学术后辈的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对先生最有意义的纪念。

梁启超构建新式中国通史理想的实现

我最初读的是吕先生的四部断代史，作为教学依托，觉得资料非常丰富，省了许多检阅古书之劳。20世纪90年代后，终于能读到《吕著中国通史》和《吕思勉遗文集》。读得多了，有点觉悟，才进而想到我们应如何定位吕先生的学术成就比较准确？前几年做百年史学历程与通史编纂的回顾，在几篇文章里约略说过一些不成熟的看法。^①现在我试作这样的定位：吕先生既是梁启超“新史学”旨趣的实践会通第一人，又是把新史学向中国社会史方向开拓的先驱者。是否准确妥帖，不敢自信，诚恳期待学界批评指教。

在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新史学”，特别是编纂新式通史，是由梁启超先生倡导、鼓动起来的。对梁任公，吕先生是崇敬有加。13岁起就

① 参拙著《史家与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从《时务报》上读梁文,除被禁的《清议报》不得阅览,那时“梁先生的著述殆无不寓目耳”^①。照吕先生的说法,梁任公是狂与狷兼而有之。惟其狂,故敢开风气之先,登高一呼,树立起“新史学”的大纛。作为新史学的开创者,当时代的潮音初到,他比较别的人更早敏感,而且有那种本领,能够用振聋发聩的方式,唤醒旧环境中人起而变革。从后来史学的进展来看,梁先生的许多看法确实极具前瞻性,但也不免有些偏激和粗糙。吕先生在1941年说:“梁先生的史学,用严格的科学眼光看起来,或者未能丝丝入扣。从考据上讲起来,既不能如现代专家的精微,又不能如从前专讲考据的人的谨严。他所发表的作品,在一时虽受人欢迎,到将来算起总账来,其说法能否被人接受还是有问题。但他那种大刀阔斧,替史学界开辟新路径的精神,总是不容抹煞。现在行辈较前的史学家,在其入手之初,大多数是受他的影响的。”^②吕先生始终忠实于“新史学”的旨趣,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后来的实践中丰富也修正完善了梁先生的新式通史计划。吕先生虽不曾亲炙,却从不忘梁任公引领启牖他走上新史学道路的“师恩”。

梁启超的大志在政治上,奔走呼号,日不暖席。尽管后期多次动摇,屡屡反悔,直至临终之前,外界环境和他本人的心志,仍不容许他专心史学。那为什么还要选择史学变革展开大动作呢?在以前的中国,什么学问最发达?为帝王“资治通鉴”的历史学。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最丰富的学问是什么?还是“资治通鉴”的历史学。^③试想经史子集四部,其他三部也都是史材。再进一步说,中国历史学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政治。从上古三代起,历代当政者无不推崇史学。几千年来,一般人受的教育,环境里受熏染的,也都是这些东西。所以说,中国人的政治意识特强,运用政治斗争的手段和经验往往也滚瓜烂熟,人人有一手。这里头祸福相倚,但从长时段的社会变迁来看,梁启超认为,史学专注于王朝政治,专注于少数帝王将相、大人物,“群体”的历史、“普通人”的历史被冷落掩盖,旧法子、陈药方不断被沿用而乏自省,民主意识不容易成立,毕竟祸大于福。“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

① 《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第10页。

② 吕思勉:《史学上的两条道路》(1941年),《吕思勉遗文集》(上),第469页。

③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世纪文库”本,第13页。

能见及此者。此我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发生，而群体终不成立也”，梁先生说这话时是痛心疾首的。^①

梁启超在政治上多半是失意的，但他对这方面的思考应该说相当有深度。他比较早就意识到，愈后愈强烈，旧邦维新，要使帝制中国变为现代民族国家，“新国”必先“新民”。他从正反两方面都强烈地感受到了，要想成功地改造中国社会，不改善国人的知识素养，势将缘木求鱼。这就想到了要改造原为统治者“资治通鉴”用的旧国史，用新文化、新方法编写国史，让新一代人用现代的眼光检讨中国的过去，以利于走向未来。^② 因此，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的同时，就立志要编写一部全新的《中国史》，把“新史学”的主张转化为可以广泛传播的通史教材。可梁先生又实在是太忙了，心志虽高，终无真正静心下来做学问的充裕时间。算到1921年在南开作“历史研究法”的演讲，“蓄志此业逾二十年”，先生自己说已经积累了不少初稿。从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直至临终前，除了两份草拟目录外，只有《战国载记》、《社会组织篇》属通史计划之内，其余学术史、思想史的论著都是为之作准备的。最后一次与清华同学聚会在1927年夏，先生已经转为寄希望于同志和清华同学用二三十年工夫集体编著《中国通史》，力不从心的怅惘，溢于言表。^③

梁氏“新史学”后继有人是不成问题的。因为这不仅是个人的意向，而是时代潮流使然，是社会变革在召唤。从成果方面评估梁启超“新史学”的传播及其影响，可以从两方面来展开：一是“专门史”的成绩，即“史”的分支领域的开拓，不少新分支确是直接受“新史学”主旨的启发，由成立而壮大，从事的学者也最多，不在本文论列范围。二是“普通史”（通史）的成绩，这方面从事的人相对前者要少得多。其中梁氏及门弟子张荫麟、萧一山均得“新史学”通史旨趣之真传，成绩卓然，但都没有能够一通到底。一个开头至东汉，不幸英年早逝，戛然而止；一个

①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② 日本明治维新的一个经验，就是借编写历史教科书刷清一代人的思想，故明治时期编教科书风味极盛。后来，内藤湖南倡“唐宋变革论”和新东洋史，也是通过其与弟子合编中等教科书《新制东洋史》，广为传布。梁启超受到日本这方面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③ 有关情况我在《萧一山与清代通史》、《中国通史编著百年回顾》两文里有过简略的介绍。不赘。《战国载记》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46，专集之47收有《地理与年代》，专集之48收有《志语言文字》，专集之49收有《志三代宗教礼学》，后附两份通史目录，详拙文后议。《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则被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86，全文八章，最见先生通史编撰新意。

以清代收尾,未能如老师所许,回头收拾,中间空缺大半截,梁氏通史的壮志终未能在自己的弟子手里实现,殊为遗憾。^①可梁先生怎么也没有想到,真正实践其旨趣,并完成他构建中的新通史理想的,竟是一位从未谋面、从旧学走来的东南“私淑弟子”吕思勉。凭两部出色的中国通史、四部中学教材,以及四部功力非凡的断代史(实际是先生精心设计的“史钞”样式“大通史”^②),说吕先生是梁启超“新史学”旨趣实践会通第一人,我想梁先生在泉下也会首肯的。需要特别补充说一句的,吕先生的六部大、中学通史教材不仅学术含金量高,而且都是从远古一直写到编著时的当下,个人独著,一通到底,往时罕见,今也无有。

历史就是那么有趣,虽不能说是梁先生“桃李不言”,但还是应了梁先生开出的新路径“下自成蹊”的佳话。偶然中还有必然,这是学术史上的一种因缘,因缘中的一种互缘,特别值得说一说。

这种因缘首先来自于学术的内在理路。关于梁启超的“新史学”,学者多侧重从“变革”张扬其作用,却多少轻忽了其承继前学而来的脉络。1923年北大历史系创始人朱希祖为萧一山作《〈清代通史〉叙》,先生曰:“清代学术,以考据之学为最长,直超出乎汉唐以上;而斯学发达之原因,有正因,有旁因。每观世人泛举旁因,而不能抉发正因,诚为治史者一大憾事!”^③朱先生竟从明中期文章复古之风追溯起,谓欲复秦汉之文,必读古书,必先能识古字,于是《说文》之学兴焉,由此而音韵之学兴,继而实学训诂之风起,再至欧洲算数舆地之学输入中夏,乃由综贯中西的考据之学起而易为今之新学。这一梳理学术脉络的长篇大论,无疑是借萧一山的创作,提示“新史学”不是凭空而起,无源不能成活水。

① “专门史”与“普通史”相对待的说法,自西方史学引进,为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学者所习用,我们在梁启超与吕思勉著作里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区别法。普通史,一译“普遍史”,就是今天所说的通史。断代史,严格意义上是不能称“普通史”的。梁启超原希望萧一山在完成清代史后,续写全部通史,却未能遂愿,参拙著《史家与史学》有关章节。

② 已出版的有《先秦史》(1941年)、《秦汉史》(1947年)、《两晋南北朝史》(2册,1948年)、《隋唐五代史》(2册,1959年)。先生晚年体衰多病,余下两部断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已做了史料摘录,惜未能完稿,是为史学界一大遗憾。此一样式,在《中国史籍读法》中先生有说明:“现在史学界最需要的,实为用一种新眼光所作的史钞。”搜选材料,仍依原文,已见则别著之。《吕著史学与史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9—90页。

③ 朱希祖:《〈清代通史〉叙》,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新版萧一山《清代通史》前列原序。

20 世纪以来,像梁启超、朱希祖那样,殷切期待有一部足以担当得起开发新民智的“中国全部通史”,几乎是所有新知识阶层的共识。然而对承担这一任务的史家说,目标是那么地高大,条件又是十分地苛刻,能之者百无一二,以致傅斯年当年认为编写新通史的时机远不成熟,而张荫麟在 1940 年,一方面强烈感觉到“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非有一部新的中国通史作“自知之助”,一方面却感叹“编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冒险”。吕先生 1952 年议论到华东教育部组织专家研讨中国通史教学大纲的编写,尽管他也拟出了一份大纲,但劈头即说:“中国通史是一个极重要而亦极难讲授的科目。”^①

基本的一条,要编写“中国全部通史”,必先通读完中国历史最基本的史料,对史料搜辑、考据、述论、编纂诸事要有一定的阅历和造诣。梁启超在正、补两编《中国历史研究法》里开出了一长串书单,分门别类,可谓精要周到,以为是治史者所不可不读的,但在《自序》里还是如实地承认:即使是从幼童时读起,“白首而不能殫,在昔犹苦之,况以百学待治之今日,学子精力能有几者?”梁先生感叹这样的标准,“在昔”苦读诗书的时代还少有人做得到,而今新式学校是觅不得这样的宝了。像梁启超这样天赋聪明的人,无暇坐冷板凳;看书稍粗糙些,不免也被非议。所以,吕先生反复强调“苟讲学问,原书必不可不读”,“不论在什么时代,学问之家,总有所当循的门径,当守的途辙,此即所谓治学方法”^②。以此衡量,治通史的“入门线”是很高的。此非笔者妄自造作吓人,特引章太炎 1933 年在上海大学教职员联合会上的讲话,就可以见得当时凡有共识的“入门”标准,恐怕今天的博士生也难能做到:

太炎之言曰:史书文义平易,每日以三点钟之功,足阅两卷有余。二十四史三千二百三十九卷,日读两卷,四年可了。即不全阅,先读四史,继以正续《通鉴》、《明通鉴》,三书合计,不过千卷,一日两卷,五百日可了。不到十七个月,纪事之书毕矣。欲知典章制度,有《通考》在。三《通考》除去冗散,不过四五百卷,一日两卷,二百余日可了,为时仅须八月。地理书本不多,《元和郡县志》、《元丰

① 吕思勉:《拟中国通史教学大纲》(1952 年),《吕思勉遗文集》(上),第 537 页。

② 吕思勉:《史学上的两条大路》(1941 年),《吕思勉遗文集》(上),第 469—474 页。

九域志》、明清《一统志》大致已具，顾氏《读史方舆纪要》最为精审，不可不读，合计不过五百卷，半年内外可毕。《历代名臣奏议》，都六百卷，文字流畅，易于阅读。一日两卷，不过十月。他如《郡国利病书》、《清史稿》等，需时亦无多。总计纪事之书，需时年半；典章之书，需时八月；地理之书，需时半年；奏议之书，需时十月。以三年半程功，即可通贯。诸君何惮而不为此乎？^①

所幸天不绝人，“在昔苦读”的人那时还有少数保存。梁氏通史的计划要由这些稀有的、梁先生素不相识的“读书种子”来完成，很像是传奇故事。以笔者有限的阅读，除吕先生而外，当时还有像范文澜等少数老先生，兼通新旧两学，在通史的大天地里皆能出入自如，不失通史原旨。^②

吕先生的读书不仅完全符合上述“入门线”，而且加数倍之力超额完成。1941年先生在《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里说苏常一带读书人家，本有一教子弟读书之法，使其先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啻在读书之前让他先了解目录学和学术史。此项功夫，先生在16岁已经做过，经史子三部都读完，惟集部仅读一半。故先生不无骄傲地说：“我的学问，所以不至于十分固陋，于此亦颇有关系。”17岁，先生受同乡“小学”名家丁先生的指示，把《段注说文》阅读一过，又把《十三经注疏》阅读一过，后来经史出入自在、相互打通，植基于此。至于遍读正史、三通，前节已详，更是奇迹。此外，先生早年读《日知录》、《廿二史札记》十分用心，特别服膺亭林先生经世之学。^③对章太炎的文字学，先生也用过功，对训诂考据之法相当重视。但先生认为：

① 吕先生在1939年写有《史学杂论》一文，内云：“苟讲学问，原书必不可不读。”文内记述自身体验，称：小时读康南海《桂学答问》，尝见其劝人读正史，谓既不难读卷帙亦无多，不过数年，可以竣事，倘能毕此，则所见者广，海涵地负，何所不能乎？当时读书之精神，为之一壮。及近年，复见章太炎在上海各大学教职员联合会之讲演稿（二十二年五月）。谓正史大概每小时可读一卷。史乘之精要者，不过三四千卷，三年之间，可以竣事。其言与南海如出一辙。上述章氏引文，见录于《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第202页。

② 参拙著《史家与史学》“范文澜：追求神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第22—25页。

③ 先生自谓6岁从塾师读《四书》，仍属于一般常规。其后这位薛先生竟让还是幼童的学生开始读《通鉴辑览》、《水道提纲》和《读史方舆纪要》，着实令人惊讶。9岁时，夫人为其爱子讲解《纲鉴正史约编》，10岁后又从魏先生读《纲鉴易知录》，将《易知录》从头至尾点读一遍。其后，父亲让先生通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令先生泛读《日知录》、《廿二史札记》和《清经世文编》。从此顾炎武、赵翼，后来加龚自珍，成为先生最早私淑的史学三先生。16岁后立志治史，开始独立并系统阅读正续《通鉴》、二十四史与“三通”。详《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

考据是由读书时发现问题才去应用,而发现问题,一半系天资,一半由学力,不能刻意追逐。大抵涉猎的书多了,自然读一种书时,容易觉得有问题,就需要考据。所以讲学问,归根到底,根基相当的宽阔最为重要。^①

在立志治史之前,就已经读了那么多的书,称绝于常州。这是因为吕先生是在数百年读书仕宦世家长大的,父母两人合力悉心培养,完全按照严格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来训练;常州又为“今文经学”学派的文渊之乡,硕儒众多,习经成风。先生从幼童起就熟读古代经书、史书,浸染于“经世济民”的精神领域里,又受到父亲“隐而不仕”人生观的影响。他的读书没有个人功利的目的追求,崇尚的是知性和德性的奠基。但必须看到,如果不是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是内乱外患的激烈震荡,吕先生要想成为他心目中所崇拜的顾炎武,恐怕也难。没有切肤的亡国之忧,没有新思想的浇灌,深入骨髓的历史反思,既无动力也无营养滋补。最好也只是赵翼、王鸣盛、钱大昕再世,常州学派中多了一位更以史学见长的传统学者。受康梁问道之学的启牖,在“新史学”的召唤之下,方有先生一生通史事业的创造。现在有学者研究指出,由今文经学的“经世”转轨为“新史学”,是学理内在的自然脉络,^②吕先生恰恰正是连接两者“转轨”成功的典范。在梁先生是平生不识吕常州,^③可算是意外收获;而在吕先生,读书无意“急用”,乃最后显为大用。

梁启超壮志未酬,留下两份草拟的通史目录,前已说过。我发现《吕著中国通史》的构架非常符合梁先生殚心积虑设想的原旨;不同处,吕先生的通史目录较为简练合理,更切大学通史教材的实际。兹将梁先生草拟的通史目录与《吕著中国通史》目录列表于下,读者可以对照:^④

① 文见《吕思勉遗文集》(上),第407—411页。

② 请参阅路新生《经学的蜕变与史学的转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③ 1923年,吕先生《白话本国史》出版,同年写有长文与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商榷,刊于《东方杂志》(今收入《论学集林》,第19—33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此为先生早年第二篇正式发表的史学论文。文末云“倘梁先生不弃而辱教之,则幸甚矣”。未见梁先生有回应,故有“不识”之语。

④ 梁先生的两份目录,到林志钧编辑出版《饮冰室合集》后,方始为外界读到。是书由林氏于1932年编就,中华书局1936年排印出版。吕先生对社会史的考虑,始于1920年,目录成于1929年。先生是否看过这两份目录,从现有见到的文字里找不到确证,有理由认为,属于心通暗合。